



朱

一

汤显祖觉得非常可惜,他心里知道吴搢谦是一个才气甚高、抱负甚远的人。“这样的人被贬,于国于民于己都是坏事。”他想写一封信去安慰,可是零星起笔好多次,却不知道从哪里说起。

写半的信笺落了一地,他决定还是要从南京赶去镇江。

这一年是明万历十三年(1585年),汤显祖是南京太常寺博士,吴搢谦将从镇江知府贬为两淮运判。

汤和吴可算是至交,15年前的隆庆四年他们同年中举后就相识,他们都是内心清高又不喜结交权贵的人,故而书信不断。

见面的场景是落寞的,两人以文煮酒,以愁注樽,连续数日。后,汤显祖写下《送淮扬分司吴年兄并问谢山子》,青衫拭泪,一个东上,一个西去。

从知府到两淮运判,兜兜转转,吴搢谦好像走了一个轮回,这一次的“走”和当时的“来”一样让人觉得意外。

他的第一个官职是遂安县令,正七品。不同的是,那时他在仕途上风顺水顺:在任内,他约己为民,然后调南工部主事;宰相张居正迎养其母,沿途官员争相巴结,唯独吴搢谦不送礼,张居正赞,升其为南比部郎,出守镇江……

左迁运判来得如此之快,他没有准备,之后越来越消沉,官职始终徘徊在六品上下。

眼见自己的施政方略无地可用,他愈加想念当时的遂安,当时的瀛山书院——

初到遂安任县令时,他刚中进士,意气风发。

据说,当时吴搢谦到任不足一周就先去了瀛山书院(今淳安姜家镇郭村),一行作陪的还有县衙分管教育、税收的官员,盘桓两日方回:第一是拜了朱熹,作了“方塘(诗)解”;第二是召集一众乡贤,为瀛山书院筹款,“邑人‘三方(方应时、方世义等)’,共捐田十余亩”——这也是书院重修后第一批捐田。

二

今年夏秋,我曾先后四次去郭村,瞻村中宗祠,拜书院和方塘。和古时的记载不同,四进的瀛山书院现在仅剩一座孤零零的大观亭,从明隆庆三年至清乾隆三十九年收捐的82亩6厘3毫良田,也早就被村民分派了去。这些田其实非常特殊:初始,它们以“方塘”立户,丁银免派;清顺治二年,免加派辽饷、勦饷、练饷等项;康熙三十年,永免差徭,免漕粮;到最为清寡的雍正时期,这些田地依然被李卫总督请旨“凡杂徭均予豁免”。

这一切,詹安不知,詹仪之亦不知。

詹安于北宋熙宁年间建瀛山书院,“躬教五子,皆举进士”。詹安之孙詹仪之一举将书院带入“瀛山一席,与鹿洞、鹅湖并成鼎足”——“繁盛”的引子来自一次普通的访友。

要先提一个人物:宰相张浚。他与詹仪之父辈(多在朝中为官)、以及当时的秘书省正字朱松均私交深厚。张浚有子张栻,精于理学,为湖湘学派集大成者。

1151年八月,朱松之子朱熹入临安铨试,授左迪功郎、泉州同安主簿。詹仪之当月也在临江城,会试后到张栻家拜访。谁都没有想到,父辈的缘分在这一天得到延续——詹仪之不仅见到了张栻,还见到了同在张家为客的朱熹,三人一见如故。

20年后,还是秋天。应詹仪之邀约,朱熹率弟子到瀛山书院,一时鸿儒谈笑,名士雅集。

最开始只是朋友之间的讨论,比如《方塘诗》,比如“格物致知”,后来“聚之者众”,于是就变成了开课:格致、立志、慎修、安贫,讲学之外还有每月三次会文。

朱熹的到来,让瀛山书院容光焕发。张栻来了,博士兼国史院编修吕祖谦来了,朱熹的私淑弟子、户部尚书真德秀也来了。有人评论说,当时的书院装下了南宋的半个朝廷。

还有两个人:明代的王畿和钱德洪,是他们让书院变得更有气质,并且让所有的典籍都气质芳华。

他们都是王阳明的弟子,也都是协助师傅指导后学的主要助手,均有“教授师”之称。王畿先为师傅守孝三年,然后致仕,然后辞官,曾来往江、浙、闽、越等地讲学40余年,年及八旬仍周游不倦。钱德洪则是在正德十六年率侄子门生74人迎请王阳明并拜师。王阳明奉旨出征广西时,他主持中天阁讲席。以上二人曾多次到瀛山讲学。

“学而知古,授则明心”的风气始于朱熹,此后代代推演,瀛山书院之高,“翘楚东南”。

三

这样一些人,会教出一些什么样的学生?

看到那个青年了吗?他每天早晨都第一个坐窗借光,每一次面师都虔诚聆听,每一笔墨法都发自内心。他就是詹仪之的孙辈詹癸。从1171年开始的4年间,他几乎每天都能得到理学、文学大家的“面授机宜”,于是在1175年殿试时,文章之端即写“天下未尝有难成之事,人主不可无坚忍之心”。

南宋孝宗听闻,又拿试卷开读,心下大为欣赏,擢为第一,钦点为状元。

由詹氏修建的书院,由詹氏广开的学路,近水楼台,詹氏一门,科举大喜。遂安旧志载:在两宋,遂安有二十人中举(不计已考取进士者),其中詹姓十九人;共有46人进士及第,其中詹姓有24人。

其实,其他的举人、进士,不少也受了书院的光泽——

詹氏子弟从小就在这里上学;詹氏女子出嫁所生育的男孩子也来此求学,遂安康塘的洪志曾就是其中之一。洪老先生自己好隐、好琴,与朱熹时常谈风弄月,但他却要求儿子拜书拜文拜师,几年艰辛磨砺下来,三个儿子均中进士。

瀛山书院,就这样从詹氏家塾逐渐变成一个遂安特有的半官方半民间的学校,多时有上百后学在此研墨拜书。

非常让人奇怪的是,在古代通讯那么落后的情况下,学子们是怎么知道瀛山书院的?他们是怎么知晓这里有名师讲学的?又是谁给了他们不惧偏远、异地求学的勇气的?

四

我翻查过南宋、明代的淳安/遂安进士谱,或多或少,在这些人身上都找到朱熹的影子,框出和瀛山书院的交集。

如果忽略那个只存在90多年的好武元代,瀛山书院的书声自宋代始,至文革止,朗响了900年。朱熹的4次瀛山行,点亮了中华大地上这一盏深山书院的灯。留下的当然不只有“双桂堂”,不只有“朱文公祠”。

元代颓废过后,瀛山书院在明隆庆二年由遂安县令周恪敛资重建,规模更甚:从乾隆年间所绘的《瀛山书院图》可以看出,此时瀛山书院主体院舍,规模宏大。过仰止亭,入“豁然”门即瀛山精舍,中首进额“瀛山书院”,二进“格致堂”……

书院一直到文革被毁之前,都处于正常的办学之中:府县的重视和乡贤的支持是书院存在的基础。朱熹的好文、格物,尤其是他的宇宙观、生命观和天人观,一直在书院里传播。深得其旨者或育人或为官,他们走出大山去,面向更多的人去教、去说、去体验,尊尚自然的思想被代代推演……

这样说来,朱老夫子还在,他的弟子们也还在,在大观亭,在百琴楼,在典籍的夹页中,在尚学崇文者的心里。

本报首席记者

鲍亚飞

通讯员 汪永明

文/摄

